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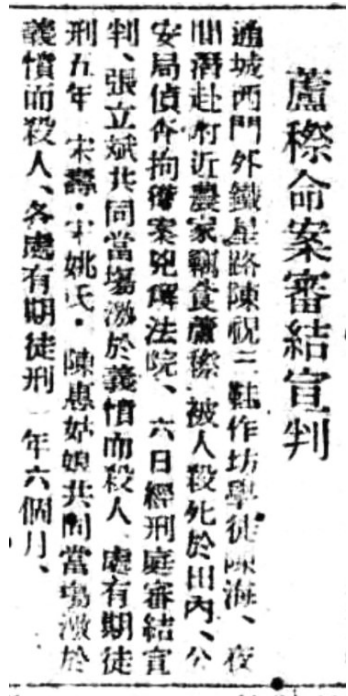
## 意想不到的芦稭趣闻种种

□ 羌松延



上:1991年10月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(左一)在通考察。

下:1934年12月8日《申报》关于南通芦稭命案判决的报道。



光绪二十三年,张謇还在“试海门芦稭炼糖”,并记下详细数据与试制结果——“试芦稭煎糖:芦稭42两,榨汁9两5钱,渣26两(皮去6两5钱),收膏1两5钱。膏如厚怡糖。”

此外,张律、朱成的《龙游乡味》里曾写道,若“将芦稭、高粱等按一定比例酿制,能产出绵甜柔和、回味悠长的高粱美酒”。民国年间的南通“芦稭烧”曾小有名气。如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上,参展的酒品中就有来自南通普善号的芦稭酒。另有缪文煜1936年撰《耕茶之物种》,当地所产“芦稭烧”也被记入其中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备受人们欢迎的芦稭曾屡被禁售。究其原因,原来是“芦稭一物,中含水分甚富”,但因“渣皮狼藉街衢,颇不清洁,而蝇蚋(按:指苍蝇和蚊子)丛集,尤足妨碍公共卫生”,为此,当年的南通“警厅曾经示警当街售卖”。其实,早在三年之前的1924年,“石港四门,有小贩肩售芦稭,市民购食,甚形踊跃”。有访员因芦稭“皮渣星布满街,蝇蚋麇集,尤为疫之媒介”而投书《通海新报》,呼吁“芦稭宜禁”“亟宜取缔”。——如此看来,芦稭被禁,主要是糖分太高惹的祸。

虽是农家寻常之物,却有人因贪嘴而送了性命。1934年8月底,南通城西锦兴祥鞋帽店学徒陈海侯,夜间潜赴西门木行桥陈姓田内偷窃芦稭一根,“为田主所觉,加以凶殴,拒伤中要害,竟至毙命”,酿成一桩命案。上海《新闻报》等媒体曾以《一根芦稭一条命》等题目,连续报道该案发生与审判过程。

吃芦稭,也是游子们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。以致乡人外出探亲时,若

能带上当季青翠的芦稭,常能一解在外打拼者的乡愁。1991年10月,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来通视察,曾向时任南通市委书记吴谔问起:“今年的甜芦粟还有吗?”尝过之后,又带了六根南通芦稭回北京。吴学谦生于上海,从小对芦稭(上海人称甜芦粟)很熟悉,此时又逢秋季,正是芦稭成熟时节,自然就想起了童年的味道。

南通人爱吃芦稭,于是将芦稭融入了日常用语中。例如以歇后语“芦稭苗儿拉二胡——自糊自”,来调侃那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。就连南通人打长牌娱乐时的“牌儿经”里,也有“芦稭做酒红茵茵,玉米做酒竹叶青。芦稭糟,西北人儿栽,笤帚把儿夹到沟东卖”等语句。

自古以来,崇启通海的芦稭比较甘甜,名头不小,早就有了规模种植。如1924年10月曾有报道,海门老农倪绍青,当年“夏种芦稭千余步(按:一步田约合四亩),入秋以来,发荣滋长,刻已成熟,开园售卖,搭棚监守。除邻近购啖外,远乡批买者,接踵而至”。如今,启东、海门等地更有专业种植户把芦稭做成了产业,仅启东市的芦稭种植面积就有15000亩左右。其中,启东海复镇家禄村“嘴爱农场”的芦稭种植达160亩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,该场的芦稭口感甘甜蜜爽,备受市场青睐,乡间土产,竟成“网红好货”。

2018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“启东芦稷”(按:查阅民国南通报刊,均写作“芦稭”。孙锦标《南通方言疏证》亦作“芦稭”,并注“此‘稭’字,通俗则读若‘基’”)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。有了品牌的加持,不仅拓宽了村民们的增收之路,还让更多人了解并品尝到芦稭的独特风味,让这份来自南通的甜蜜传得更远、更久。

又是一年秋来到。正是抖芦稭、剥芦稭、吃芦稭的时节,笔者于是也凑个热闹,来说说芦稭。

据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卷四“物产”：“芦稭，蜀黍也，五月熟为上时，七月熟为中时，八月熟为下时。”而1912年科学书局《栽培新编》收有词条“蜀黍”：“禾谷类中最高之植物也，我国北部栽植最多，南方亦多栽之。南人称为芦稭，北人称为高粱。”很明显，州志所记芦稭就是高粱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，上海新华书局发行的大型工具书《日用万事顾问》，在农业篇“种谷要诀”部分，将芦稭与稻、麦、芝麻等五种农作物同时收入其中。此处的芦稭，仍是指的高粱。

当然，我们今天所说的芦稭并非高粱，而是高粱的一个变种——甜高粱（也称糖高粱）。清光绪《海门厅图志》卷十“物产”：“今高粱别种曰芦稭，茎甘可食。”另有记载：“甜高粱为一年生禾本科植物，系禾本科高粱属粒用高粱的变种，原产于非洲，作为饲用及糖料作物被长期栽种，有‘北方甘蔗’之称……在长江下游地区普遍种植。”简要说明了芦稭的由来与分布等情况。

作为地方土特产，肉质松脆、汁多且甜的芦稭早已成为上海崇明及本省苏州、泰州等地农村的常见植物，在南通更是被家家户户广泛种植于田埂渠畔、十边隙地等处，每届夏秋，几乎随处可见。而与之伴随的，是一些地方历史记忆的碎片。

芦稭用途十分广泛，因其“茎秆富含糖分，营养价高”，故可“产糖、糖浆，还可以做酒、酒精和味精，纤维还可以造纸”。为推动土地增效、农民增收，早年在乡的张謇曾提倡蚕桑，以惠及乡邻，即便是大魁天下之后的

## 骑岸镇赛马

□ 程太和

上海早有跑马场举行赛马活动，南通北乡骑岸镇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，也有了每年一度的骑马比赛，由此名声大噪。

为抵御海潮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率民工在此地围筑海堤，始称“皇岸”，有岸可通骑，由此得名“骑岸”。

苏北本不产马，良驹多求于张家口之外。南通地区也不例外。当年南通北乡的赛马，大多由几个财主集中的大庄子轮流主办。骑岸集镇周边有多个好马的财主，由他们出面举办赛马之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。为了便于民众观看，赛期大多选择在相对农闲的农历二月初二至二月半之间。

在赛马的数日前，就组织人员将村

前的大路修整平坦，用作跑道。这时四乡八镇的小商小贩就沿着大路搭起芦柴棚来做生意。集镇周边哪怕是较穷的人家，也要接上几个亲友来看赛马。大户人家更是热闹非凡，至亲好友，先数日即举家来临，赛马过后还得住上几天。还有南通城里的达官公子、富太、小开也多有乘船到骑岸来看热闹的。

赛期一到，大清早跑道的两旁就挤满了人，那些活力充沛、身体敏捷的人早就爬到了路旁的大树上，把树干都压弯了。比赛开始前，先是预热，即由本庄的二、三流马儿在跑道上跑上几趟，以慰观众。约莫八九点钟的辰光，爬在树上的那些小伙子，首先发出惊人的怪叫，原来是他们看到别村的马儿来了。果然四面

八方都有尘土飞扬起来，渐渐地尘土中出现了人和马，由远而近，煞是壮观。那些名驹骏马按照各自的编号统一进场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，骑手按辔徐行，因为这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。此时，主持赛马的头儿、也就是本次赛马活动出钱最多的主儿，在众多骑师的簇拥下策马前来，向众马友一一拱手为礼，俨然主人架势，颇显威风。

任凭观众如何喧闹，正式的赛马总得拖到晌午时分。与跑马场的赛马相比，乡下的赛马当然带着一个“土”字，没有秩序册、没有裁判员、更缺乏后勤保障。赛马场上没有固定的起跑线，也没有工作人员手持发令枪发出起跑信号，而是由一马先跑，接着其他马急起直追，

跑输了的便一去不返；获胜的则带着无比的自豪感沿原路回来，接受观众的欢呼后，回到广场休息。这时第二组又开赛了，之后再依次是第三组、第四组进场……最后才是总决赛。

当年骑岸一带，包括邻近的石港、十总以及如皋东乡曹埠（今属如东）地区蓄养马匹的人家多，参加比赛的马也多，故总决赛总要到日落前后才能完毕。马儿跑胜了，不仅是主人的光彩，同村的观众也觉得很有面子。因此，往往马儿已入厩休息，而观众们的谈兴还正浓厚呢。

1937年后，全面抗日事起，乡村的名驹骏马也投身到抗战前线。从此，骑岸镇赛马这一延续了多年的传统活动不得不消失了。

## 海安“五坝”

□ 苏学勤

别要提到两处，一是“万民洞”，二是“中樞桥”，这两个地方如果决口，大水就会冲入繁华地区，其重要性非同一般。

“中坝”这个区域，几百年来一直是海安古城的商业中心，这里有商铺好几十家，还有许多官方机构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而“中坝”不仅要防通扬河的大水淹城，还要防北大河大水“倒灌”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海安发大水，我就看到中坝口向北几十米处，筑起一条一米多高的“土坝”，麻袋和草包里装的泥土，堆好在旁边，严阵以待。

“下坝”是指当年中坝口北边下坝东河向西的区域。这里要顾及新华路上的几千住户。一旦水冲过来，将会影响到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的生活。

团结桥古称“杨家桥”，这里向西有一条小河，直通西寺庙和草坝口。这里有全县唯一的海光发电厂，还有粮库和

米厂，不能疏忽。当年的“草坝”区域，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东西向的通扬河道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是一条水上大通道。那时的“草坝”并无桥，向西拐两个弯就是三里闸。三里闸还没有改造时，发大水就开闸日夜放水往北流，也是一项排涝大举措。

1954年7月，海安发大水，时任县长景文光亲临一线指挥。当他看到有人离岗到被水淹没的路上捉鱼时，急得掏出盒子枪大吼：“如果离岗去捉鱼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景县长的吼声镇住了那些“捉鱼人”。

徐坝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。从如皋方向而来的大水汹涌澎湃，必经此处。1954年发大水时，海安汽车站的客车因大水不能进站，乘客改由徐坝桥北上下。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多辆大客车在这里转运旅客，井然有序。

## 东皋三琴递藏捫谈

□ 子安

世事若白云苍狗，分合无定，历史上流散无踪的琴不知凡几。相比之下，云闲能得三床传于后世，且都在琴人手中，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
广陵故壤，东皋古邑，地得江海钟灵，宋元以降，琴人辈出。查阜西所编《历代琴人传》，录皋籍琴人达十三位之多。其中，成就最高的当属广陵派琴家云闲。云闲（1839—1912），名空尘，所著《枯木禅琴谱》为广陵派五大琴谱之一。杨葆光为其作传：“上人名空尘，俗姓姜，如皋人，琴之外兼能书画。”他晚年曾回掘港重修祖坟并立碑，碑文：“光绪二十五年，姜氏之墓，后裔释云闲敬立。”

云闲启蒙于如皋菩提社牧村，后遍访名师，最终定居苏州。朱敏文序云：“后上人卓锡虎丘。”沈秉成序云：“云闲为余方外交，居虎丘。”故云闲身后，其琴多遗留苏州，递藏可考者尚有三床。

第一床为仲尼式“寒泉”琴，长122.5厘米，隐间112.5厘米，肩宽19.5厘米，尾宽12.8厘米。髹黑漆，间有朱砂。琴面以小蛇腹断、小流水断为主，局部有梅花断。长方池沼，龙池上方刻琴名“寒泉”。腹内墨书分别为龙池右侧“乾道四年紫阳朱氏藏”，龙池左侧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”，凤沼右侧“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。顾韵泉，名沂，为云闲好友。他是如皋螭山人（今属如东），擅古琴制作与修复，听有落霞式“霜天铎”琴传世。

此琴是查阜西在上海购得，其著述中多次提到“云闲僧所修乾道四年紫阳朱氏琴”“云闲宋琴”“宋琴响泉”。可知此琴原拟名“响泉”，“寒泉”是后来才确定并篆于琴背的。

1945年，查阜西携“寒泉”赴美，回国时，将琴寄存在国会图书馆友人处。后张充和与傅汉思新婚不久，经沪赴美，查阜西让张充和到国会图书馆取回“寒泉”，作为新婚贺礼。从此，“寒泉”陪伴了张充和一生，直至2011年，西冷上拍此琴，才为他人所购。

另《会琴实纪》录有仲尼式“虎阜梵音”琴，腹内亦刻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，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。此琴也是云闲旧物，曾为琴家吴建（字兰荪，1883—1961）所得，惜抗战时被土匪掠去，自此杳无音讯。琴背题识：

此琴声音清越，以廉值得于吴市，知为云闲开土重修，故合法度。从来良材非遇良工，亦复湮没不彰。因以“虎阜梵音”名之，不忘所自也。戊午天貺节湘西吴建议。

第二床为仲尼式“一天秋”琴，通长120.5厘米，隐间112.3厘米，肩宽19.8厘米，尾宽13.4厘米。面桐底梓，黑漆，底面呈细牛毛断。腰部微收，造型精巧。琴额原刻“一天秋”三字，因漆补已漫漶。腹内烙“朱敬远制”四字。

古人常会为爱琴配以琴囊，不弹时将琴贮于其中可防尘，亦便于携带。欧阳修曾将苏轼所赠布料制成琴囊，并视若珍宝，《六一诗话》中记有：苏子瞻学士，蜀人也。尝于清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……余家旧蓄琴一张……遂以此布更为琴囊，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。

“一天秋”的琴囊，有云闲所绘水墨画及题诗，可见其十分珍视此琴，也印证了他“琴之外兼能书画”。马塘琴家邓怀农曾于苏州购得此琴，后转给梅庵朱惜辰。“文革”后，为另一位梅庵琴人刘高樵所得，至今仍虔藏刘家。

第三床是仲尼式“枯木吟”琴，通长120.5厘米，隐间112.2厘米，肩宽17.9厘米，尾宽13.1厘米。面桐底梓，黑漆，鹿角灰胎，内杂孔雀石屑，发牛毛断兼小流水断，局部有梅花断。琴尾方纹冠角与琴背一字眉式跟托颇有特色。龙池上方刻琴名“枯木吟”，与云闲自制曲之一同名。龙池下方“枯木禅”方印，与琴谱自序后铃印一致。“枯木吟”的原配琴囊在下部预设两孔，以便雁足露出。

云闲曾将此琴传给苏州弟子王元燦（字星如）。王元燦之子王鹤寿（字仲皋，1880—1952）十多岁时随父学琴，后亦受云闲指点，善《梅花》《平沙》等曲。王鹤寿有一儿二女，皆未传其琴艺。儿子和大女儿去世后，家藏古琴和琴谱一直由小女儿王梅话保管。王梅话终身未嫁，歿后，包括“枯木吟”在内的所有遗物，交由一位同事处理。同在苏州的裴金宝先生有缘成为托付之人，现琴底两足间“裴伯闻琴”方印，即为裴先生所刻。下图：从上至下依次为寒泉、一天秋及枯木吟正反面。



## 自行车曾受超严格管理

□ 朱今更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在启东海复棉厂工作（该厂前身是张謇先生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），星期天回吕四老家，皆以步代车长跑而至。成家后我夫妇二人节衣缩食攒了两年，于1966年9月购入一辆凤凰牌载重型自行车，价格145.80元，一直用到了1992年，中途只换过一次里外胎，可见质量之好。再后来买了轻便车，那部旧车因车架结实完好，送给了农村一位亲戚。当年购买自行车等全套发票仍保存完好，看上一眼便使人仿佛回到了58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购了自行车才知道对自行车管理的严格。从吕四至县城单程四十公里，中途至少有四个站点要查相关票据：一，新车看发票；二，查车龙头上钢印编号、铝牌上印刷的编号（包括碳钢印编号的交款发票）以及公安局发放的自行车行车证的三个编号是否一致，若有差异则要扣车（上述均由县公安局办理）；三，出示完税发票。

严查证件和骑车人，最大的好处是盗贼不敢偷车，即使偷到了车，没有证件也不敢上路。那时如果车子忘在公路边，过夜也不会被人拿走。这种管理在启东那地约实行了三年后终结。